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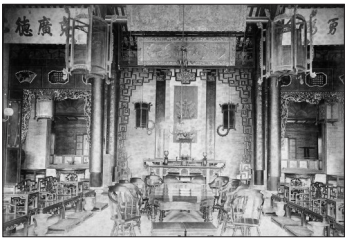
香港《循环日报》(见左图)是与上海《申报》并称的长寿中文报纸。这份报纸的创始人,长期被简化为王韬一人,这种说法很不合适。回到历史现场看,《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总局主要股东是香港华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王韬是他们聘请的主笔。

回到香港华商的历史现场

香港《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4日创刊,1941年被侵港日军勒令停刊,抗战胜利之后虽有两次续办,为时均不太长,至1963年彻底画上休止符。《循环日报》在抵制殖民势力压迫、反映华人呼声、推动中国改革、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厥功甚伟,业已载入史册。陈鸣《香港报业史稿》有如此评说:

《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自集资金、自置设备、自主编辑、自立经营的中文日报,也是清末第一家识时务、求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评论国是、针砭时弊、鼓吹变法改革、提倡发展工商业的政论报纸,对清末同光新政、变法维新以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有思想影响。

陈鸣对《循环日报》的评



谁创办了《循环日报》?

价,笔者大体赞同,唯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一条持保留意见。香港早期中文大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上海《申报》等等,都是商业性报纸,这也是这些报纸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办报纸固然离不开文人,但资本筹集与经营管理更加重要。香港早期中文报纸,首先是商业机构,政论、社论只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

《循环日报》是中华印务总局下属机构,1873年2月总局初创时期有50名股东,从中选出的“值理人”(董事)梁安、陈桂士、冯普熙,都是当时香港商界、慈善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领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王韬是中华印务总局股东。王韬自1874年该报创刊开始,前后当了约10年的主笔,中间至少有两次间断。王韬离开后,《循环

日报》继续正常营业了50多年。

《循环日报》的创办,标志着香港华商群体发展壮大与成熟。他们不满英文报纸的殖民视角,觉得依附于英文报业集团《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也不理想。刚好,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中文铅字准备出售,黄胜在该书院供职,本人又是印刷专家,于是向梁安等华商提议,组织一家纯粹华资的印务公司,收购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和中文铅字,在公司下面成立《循环日报》,代表香港华商表达意见,与他们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密切配合,争取华洋平等,进而对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改革提出建议。这是《循环日报》创办的真正背景。

“东保一家”与陈家祠

梁安(1829-1890),字鹤

巢,祖籍广东顺德,世居广州西关龙津桥,约1840年代末移居香港,担任仁记洋行买办多年。领衔创办香港东华医院(见右图)这一壮举,奠定了梁安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崇高地位。

1869年,一些垂死病人按中国习惯被移置到广福义祠,遭到在港西人的猛烈抨击。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华人对垂死病人的处理方式,本与西方人有绝大差异。在港西人将习俗问题升高到道德审判,深深刺痛了居港华人。梁安挺身而出,与各界协商,达成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的共识,组织成立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870年初,香港买办、行会商人共捐献47000元,得到港督批准,创立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1872年正式落成。东华医院还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中国方式下葬,消除了华人对身后尸体被解剖的恐惧。梁安创办的东华医院,与冯普熙为主力的保良局合作无间,被称为“东保一家”。

冯普熙(?-1898),字明珊,广东东莞人,毕业于香港圣

保罗书院,曾为香港壳洋行、有利银行买办,1869年参与发起创办东华医院,1872任东华医院总理,1873年投资中华印务总局并任值理人。

香港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广东人出洋的主要口岸,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男性劳动力被诱骗登船,前往新旧金山开矿、建设铁路,俗称“卖猪仔”;年轻女性被诱骗、拐卖到外地、外国,很多被迫从事卖淫营生,叫做“卖猪花”。为营救被拐卖女性,1879年梁安与冯普熙等联名向港府申请创办保良局,对被拐卖妇女进行实质性救助。据统计,仅1887-1895年间,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或专人护送回省内各县,请当地善堂协助资送回家;少数无法遣回者,通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冯普熙连任三届保良局总理。

陈桂士,字瑞南,广东新会人,世居广州西关,在香港经商20多年,为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创始人之一。1888年,他集资百万,用6年时间兴建起扬誉中外的陈家祠(又称“陈氏书院”,1988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岭南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摘自7月1日澎湃新闻 陈晓平文)

蒋桂战争靠“偷”密码取胜

1929年3月,桂系与蒋介石产生矛盾,爆发了蒋桂战争。战前,蒋介石即着手布置解决桂系,派其侍从副官郑介民潜入桂系活动。郑介民因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义是旅苏的同学,遂伪装穷困潦倒,借李宗义关系得以入住桂系的司令部,并寻找机会把李宗仁与各方联络的密码本偷偷拍照。蒋介石方面从而掌握了桂系电信联系情况,加之蒋介石又使出分化瓦解之计,桂系的反蒋行动很快即告失败。

当时,蒋介石甚至毫不隐瞒地表明能够破译桂系密电的秘密。比如为了证明自己软禁李济深是因其参加桂系方面“叛乱”,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方面在发出的讨伐桂系的通电中如是说:“查获李宗仁自上海致广州黄绍雄等19日电称……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必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此来为己方软禁李济深开脱。在胡宗南部下负责电信业务的王微说:

民国十八年(1929)李宗仁叛变时,李济深尚未行动,即为中央扣押。李济深不断向中央表示效忠,索粮索饷中央都照发,他却暗中响应李、白,他的电报被侦破后,蒋主席先发制人把他押到汤山去,广东于是免于沦入李、白手中。李济深送到汤山后,陈铭枢便不敢行动了,即刻向中央表示归顺,李宗仁因此很快地失败。

为蒋介石创建密码破译机构做出重要贡献的温毓庆,一般均认为他是从破译国民党新军阀密码电报开始破译生涯的。据王微叙述,温毓庆创建密码破译工作之初,在上海抄收了很多桂系的电报,因为缺少破译技术,无法译出。这时有一个看了他们在报上招聘报务员启事而来应聘的年轻人,恰好就是从桂系驻沪电台辞职出来的,

他一听到截收电码的电台就知道是自己原来服务过的,于是他“跑回李、白办事处去找旧同事要密码本,那些人不知利害所在就给了他,‘明天你一定要拿回来还啊!’他拿去,一夜工夫把密码全翻出来”。

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等率领第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方面准备充分、布置周详,派出多路人马对第十九路军进行分化瓦解,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的内应、担任第十九路军上校参谋的黄埔毕业生黎庶望发挥了重要作用。黎庶望拉拢了同是黄埔毕业的第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收买机要科长李道生,把第十九路军的密码本抄送蒋介石方面,使得第十九路军方面电信为敌所掌握。

也有密码本“主动”送上门来的。中原大战时期,陈立夫手下的干将蔡孟坚衔命潜入冯玉祥军中任应岐部,任应岐明知道蔡孟坚是蒋介石方面派来的,虽避不见面,却也没下逐客令,反倒是让蔡孟坚每天在其参谋处闲坐,结果被蔡孟坚顺手牵羊弄走了密码本。

当然,不只是蒋介石方面偷别人的密码,他的密码本也有人偷。1932年11月,《北平晚报》登载了一则题为《蒋介石重编新密码》的消息,“蒋委员长湘鄂往还,风尘鞅掌,军书旁午,书信居多,国内外各要人以至军师旅,靡不有编发密电,最重要者且注明亲译,是则此项电本慎重可知矣。不谓自湘返汉以后,所有各种密码电本,多至数十册,悉为妙手空空儿窃去”。蒋介石这个时候正是在两湖地区布置“剿共”,竟然遇到这等怪事,“赫然震怒”。(摘自《文史博览》2022年第6期 金志宇文)

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

二战之后,意大利成为战后除苏联之外拥有共产党员最多的国家,占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在逐渐加强。作家卡尔维诺(见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赴苏联的。他于1951年10月乘火车出发抵达莫斯科,11月返回意大利,前后历时约50天,一路写下了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

一是莫斯科。卡尔维诺像普通游客一样游览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普希金广场、列宁山等地,并夹杂着切身感受到的苏联与意大利的不同之处,比如莫斯科从来没有雾;比如莫斯科人习惯排队购物;比如莫斯科店铺营业时间较迟。之后,卡尔维诺开启了他于莫斯科的文化之旅,足迹遍布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电影院和大学,他几乎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和当地文化、当地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并把相关的情况写进日记中,要么是介绍某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要么是记录下一位和他一样的普通观众或读者,要么是呈现出他在参观和游览中的兴趣点。

二是巴库。如今已成为阿塞拜疆首都的巴



库在1950年代还属于苏联。在巴库,卡尔维诺参观了城市建筑,走进电影院、博物馆、科技馆、音乐厅,介绍了革命者基洛夫、诗人尼扎米、工程师卡法·罗夫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关于石油,他写到,“石油是巴库的财富,当你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油井,即便是在海上”,继而介绍了巴库的石油工人和石油联盟在巴库的文化馆。关于文化,卡尔维诺关注的是巴库的一个图书馆,他特意强调这是一个“一切都免费”的图书馆。

三是圣彼得堡。在涅瓦河畔,卡尔维诺一面流连于冬宫、圣以撒大教堂等建筑的恢宏气势,一面围绕一艘古董巡洋舰回顾着战争中城市的历史;在基洛夫文化研究所,他挨个屋子听关于外交政策、金属加工、经济掠夺的讨论会,看表演、聆唱诗、听演奏;在糖果

厂,他驻足于漂亮的生产机器,品尝各式各样的糖果。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站,卡尔维诺等人去了“玩具之乡”,类似现在的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桌上曲棍球、桌上足球、举办画展、操控微型机械装置,是一群“坚定而快乐的年轻人”。在卡尔维诺的笔下,195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稳定平和,充满活力。

基于他的作家身份,卡尔维诺本能地关注在苏联所见到的文学符号。比如,他在一个学校发现普希金的画像和列宁、斯大林的一样多,之后才是托尔斯泰、果戈里、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尤其使他不可思议的是,画像也包括后来被认为是伟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当时“西方人有人说苏联已经忘记了他”。再如,巴库之行结束前,卡尔维诺收到的礼物中包括托尔斯泰《复活》的阿塞拜疆语版本。在苏联的两个月里,卡尔维诺逛了很多图书馆和书店,注意到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哈代、刘易斯、欧·亨利等人在苏联的影响,同时也买了一些他喜欢的文学名著。(摘自6月17日《文艺报》符晓文)